

## 文化遗产评价标准小议

如何对待文化遗产，在无产阶级建设自己文化的过程中，纵非最难、也是很难的一桩事。当年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 我国的林彪、“四人帮”推行的那一套蛊惑人心的“左”派理论和政策，早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了。无产阶级服膺列宁的这个教导：“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青年团的任务》）

列宁这里提出来作为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必要条件的两个“只有”，都是说的同文化遗产的关系：一个是“确切了解”，一个是“加以改造”。了解和改造，都不免要涉及评价的标准；这个标准，我们一般是定为“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这样正反两面。

所谓“民主性”和“封建性”，在此自是一种概括的说法；它包括有人民性、革命性和保守性、反动性之类的意思。它告诉我们，只有善于从政治上了解全部文化的属性和作用，并加以相应的改造，方能建设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这些，无疑是我们区别文化遗产的重要标准。

从文化之作为文化来看，除去这种政治标准以外，是否还

应有一些适合于不同形式文化各自特性的标准，譬如科学性、真实性、艺术性之类呢？显然应该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文艺批评的标准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谈区别香花和毒草时，都说到应该有这类标准；尽管那里不是指着过去文化、而是针对当代文化说的。

其根本原因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形式文化，尤其是作为社会意识的精神文化，都是人们对一定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或是关于他们同自然关系的反映，或是关于他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反映。就是说，表现为人类文化的社会意识，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是一种认识现象；而它之所以成为社会现象，具有社会的属性并对社会发生作用，还在于它是认识现象，是一定的人们对一定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从它表示着不同社会地位人们的不同角度或观点来说，从它对于社会起的作用来说，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而从它对物质生活的反映有着深度、广度上的不同来看，从它有自己发展变化的历史来看，却又显示出它作为认识的特点。

社会意识的这样两种特性，有区别又有联系，人们要认识并掌握它们，并非一件易事。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研究社会意识，因而不能了解社会意识的社会性和阶级性。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纠正了旧唯物主义的缺点，着重强调了人的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我们今天许多同志却由此走向另一极端，离开意识的认识性，离开认识自身的编辑发展，去研究社会意识，只想到它的社会性和阶级性，不注意社会意识是一种认识，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麻烦。

评定文化遗产只知采用“民主性”和“封建性”的标准，便是其一。

按事物本性来说，既然任何形式的社会意识，都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认识现象，那末，它就不仅具有“民主性”或“封建性”的烙印，也应具有科学性、真实性以及艺术性，既具有真理和谬误、美和丑的差异。这两方面的结合，由于种种条件的影响，又并非到处都是简单的、直接的，在很多具体对象上，民主性的不必就是真理或美，封建性的也不必都是谬误或丑。因此，我们不能只见其一，不见其二，不能红纱障目，用前者去包括后者或排斥后者。

可是，多年来，教条主义在人们头脑里作怪，对于文化遗产，庸俗社会学的看法常占上风，“民主性”和“封建性”成了决定爱憎、判明取舍的简便法宝。而在封建文化中，能够发生成长并流传下来的真正民主性果实着实少得可怜，于是以灿烂辉煌著称的中华民族文化宝藏中，可供吸收的精华也就寥寥无几，我们的古代文化介绍和研究工作，只好以贫乏而苍白的面貌在勉力维持。

就在这些贫乏而苍白的工作中，更有一部分只是假借“民主性”的名义来进行的；其实所表彰的却是遗产的科学性、真实性、艺术性等成分。譬如推荐历代官修史书和某些史料笔记，就属于这一类。说者宣称它们记录有真实史迹，可以窥见历史上的劳动人民反抗斗争，所以是“民主性的精华”等等。这大概叫做从“封建性”见“民主性”吧；其实它们本身是很少“民主性”可言的。老实说来，这一类遗产，其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它们根本没有或很少具备的什么“民主性”，而只在于它们或多或少包含着真实性，这是有目共睹的。在实际工作

中，我们还曾以“反面教员”的名义，披露过另一些遗产。因为在这类文化中，实在无法窥出什么“民主性”来，倒的确包含着某种科学性、真实性或艺术性的东西，为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所需要，所以给了它一个“反面教员”的名字。这种“醉死不认这壶酒钱”的做法，是没有多少意义好说的。对我们有意义的倒是，这一类工作的实践，正好证明了科学性、真实性和艺术性应该列为精华的标准，证明了这类工作所企图回避之点本是不可回避的。

人类不会抛弃历史上已经获得的真理。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代人，不可能事必躬亲，去把整个人类生活历程重新实践一遍；总是尽可能地接受前人和他人的正确认识，以减少自己的局限。这原是人为万物之灵的重大标志之一。否则，人类必将把自己弄到等于动物甚至不如动物的地步。

当然，世界上还没有过这样的人。即使提倡“绝圣弃智”的老庄，事实上还是接受了若干前人和他人的“圣”、“智”。原因在于人们离不开社会，而社会中充满了前人和他人的智慧。但是，“绝圣弃智”以及不甘承认异己学说的真理之类的理论，则是的确存在过并且存在着的。虽说这种理论甚至对其主人都不能充分生效；但是对于信奉者，却并非效应全无。它可以使人因人废言，因“封建性”而抛弃真理性，以及诸如此类。这样的理论，当然是要不得的。

有一个时期，这种理论在实施中造成了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而使人苦恼，于是，有人发明了一种被称做“抽象继承法”的办法，试图来补苴罅漏。没想到治丝益棼，遗产的理论因之更加混乱。因为发明者信从通行的说法，认为文化遗产或是“民主性”的；或是“封建性”的；只能继承“民主性的精

华”，不能继承“封建性的糟粕”。所不同的只是，发明者把“民主性”“封建性”落实为文化遗产（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要求在某些不容继承的“封建性”的具体意义中悟出可供继承的“抽象意义”来。例如，“子曰：学而时习之”，据说其具体意义是叫人学习诗书礼乐，这是“封建性糟粕”；但其中隐藏着学和习的关系，它是迄今仍然正确的抽象意义；如此等等。可以看出，这样来谈论具体和抽象，自难免于形而上学之讥；它所谓的“抽象意义”，实在不过是该一命题本意所在的真理颗粒；至于“诗书礼乐”这个具体意义，倒是论者囿于阶级分析之类的论调而生加上去的。所以此论一出，议者蜂起，指斥者有之，同情者有之；因为它是在传统说法中去反对传统，在缜密思维下有许多不缜密之故。其实，只要如实地承认“学而时习之”之类遗产道出了某些真理，在“民主性”之旁给精华并列一个“真理性”或“科学性”、“艺术性”的标准，不拘守于一格，求真知于多方，事情就轻松愉快而且恰如其分地解决了。

人类认识本是一条无尽的绝对真理的长河，它不拒细流，包容一切相对真理。因此，使任何具有真理性的文化都汇入这条长河，使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个人精神财富变为人类的财富，即自觉地、主动地、无私地吸取一切具有科学性、真实性和艺术性的成果，以创造无产阶级文化，这便是我们的任务。列宁在回答“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时候说过，那是因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以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

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青年团的任务》)这两个“凡是”，连同开篇所引的那两个“只有”，正是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指针。需要稍加解释的一点只是，列宁这里所说的“批判”，并非我们前些年风行一时的那种“批判”，它不仅绝不意味着打倒，也不限于政治上划界，而主要是指用工人运动的实践去检验过去的成果；这种意义的“批判”，就是我们常说的“批判继承”中的批判。

在文化问题上，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恩格斯有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1893年10月17日《致尼·弗·丹尼尔逊》)我们既已经历了灾难，我们必将得到补偿。

(原载《人民日报》1980年3月13日)

## 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

### 一答《人民日报》读者问

问：请您谈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一书的工作概况，谈谈研究文化史的意义何在？

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编的种种出版物中，有一部部头最大的书，从史前谈到目前，从西方说到东方，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洋洋洒洒，图文兼备，6卷13大册，近7,000个页码有英法两种文本，它叫做：《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这部书酝酿于五十年代，1963年开始出第一卷，1976年最后出齐；是为第一版。

我国没有参加第一版的工作。第一版出书后，第三世界和日本、苏联等国学者纷纷提出意见，认为书中有欧洲中心主义影响，未能认真顾及东方国家及发展中国的历史作用，要求重写一部真正符合人类发展真相的新书。

1980年，教科文组织为此组成该书新的编委会，由我国和其他二十六国各出一名代表参加。编委们以各自方便的形式，在国内联系一批学者，参与全书的编写、审定工作。我国于今年5月聘请19位知名学者，成立了《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中国编委会。

文化史在中国，并非陌生学科。五四运动以后，我国一些

学者曾陆续撰写、翻译有文化学、文化史方面的著作上百部。仅以商务印书馆 1936—1936年间主编的一部《中国文化史丛书》而论，即包括各种专题文化史书 50种；一时之间，蔚成风气。抗战期间，延安还创办有《中国文化》杂志，毛泽东同志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就是在它的创刊号上首先问世的。

遗憾的是，1949年以来的三十多年里，除去 1979年湖南出了一本《中国文化史要论》（蔡尚思著）外，竟无任何其他文化学与文化史的著作出版。全国数以百计的文史性大小研究机构中，挂有文化史字样的，据说只有两个。这种贫乏荒芜的现象，同我们这个拥有优秀文化传统而又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大国的状况，怎么说也是不够相称的。

发生这种现象，可能带有某种必然性。因为，1949年前的种种文化学、文化史著作，许多是以文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1949年后，唯物史观成为历史学者的指导思想，人们很自然地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到社会物质生活和阶级斗争方面，努力发掘构成历史本质而恰恰为前人忽视了的东西。于是乎，各个时代的文化部分，在历史著作中往往被挤到最后而草草一笔，或者连一笔的地位也得不到了。

我们急切盼望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早早结束。要知道，文化，它是每一社会的社会发展象征，是不同时代的时代精神所在，是各个民族的民族性格表现。广义上的文化，不仅限于文艺、教、科等具体的社会意识形态，而且包容了人类从野到文、从文之较浅到文之较深的全部进化活动（当然，它是从整体意义上来看待这种进化的，这便使它同各个具体学科区别开来）。文化作为人类的进化活动，日新月异；但同时它又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形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传统力量，给社会发

展造成种种有利的和不利的影晌。

中华文化是世界少数古老文化之一，西方学者曾用“半个世界”来称赞它的影响和价值。1949年以来，文化史方面的新资料大量涌现，许多结论在凝固起来以前便被更新的发现所打破，许多成就常让一些最大胆的估计变得保守，许多贡献更使不少世界历史性的纪录瞠乎其后。这一切，都迫切要求学者们去进行研究；而最能了解中华文化价值，最能给予科学说明，最有发言权的，当然还是我们中国人民自己。

愿我们拿出足够的注意和力量来，为宣扬中华文化，为继承中华文化，为发展中华文化，也就是说，为了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来关心一下中华文化史的研究工作。

（原载《人民日报》1982年8月26日）

## 需要注意文化史的研究

一个社会，可以划分为经济部分、政治部分和文化部分；一个国家，有它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面貌；一个民族，少不了经济生活、政治关系和文化传统；甚而至于一个家庭和一个个人，也有它的经济来源、政治地位和文化状况。这是日日可见的普普通通的事实。

三者之中 政治 特别是它的尖锐表现——军事，是一切社会、国家和民族的稳定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标志，因而往往吸引住人们的视线，成为历史记述的中心。封建时代的大部分历史著作和资本主义时代的一部分历史著作，把政治史、军事史及其有关人物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是只看到历史上最耀眼的现象的缘故。

唯物史观指出了经济的决定作用，指出了政治、文化不过是矗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于是，一些先进的、认真的史学家们，开始致力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研究，开拓出不少前人视而不见的新领域，使历史学第一次变成有规律可言的科学，成绩是空前的。

但是，应该承认，当我们用唯物史观去战胜政治史观，用前人史料去重新叙说历史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往往局限于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而对于鼎足而立的文化领域，则缺少应有

的重视。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在分析一项政策、一次战争、一场政治运动乃至一个学派的兴起和衰亡时，常常只提经济背景和政治背景，绝少谈到文化背景。大有一谈文化便落入唯心陷阱的隐忧。其实历史事实并不那样简单，唯物史观也并非如此片面。

例如民族战争，除了企图或反抗经济掠夺，政治奴役外，民族心理因素起着什么作用，又是如何表现的，便很值得注意。变法运动，除了经济动因和政治目的外，孕育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和发动者的文化素养，常给不同的变法带来不同的面貌。同是农民战争，或用道教相号召，或用巫术打掩护，或用洋教作旗帜，其对于革命的兴衰胜败，绝不仅是可忽视不计的偶然因素，也不是可以等量齐观的简单外衣。西晋亡于清谈，隋唐勃兴佛学，宋明理学独步，清季朴学昂扬，都不是政治、经济可以径直说清的。小而至于一项技术发明，也是如此：我国古代瓷器制造技术十分发达，但同是只需控制窑内温度和氧还原时间便能奏效的玻璃制造技术则比较落后，二者的高下，难道与儒家的“温柔敦厚”和道家的“韬光晦迹”之类教义无关么？而玻璃技术的不发达，进而又影响了光学的无成就，当然也是事实。须知，玻璃制品在越王剑上已有发现了。

必须强调的是，注意文化因素不等于文化史观。资产阶级学者提倡过文化史观，他们把文化说成是人类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要素，用文明的划分来混淆社会形态和国家的实质，那是不足为训的。现在西方一些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又在用文化一词来概括人类的全部活动，把文化定义为生活方式；在研究历史时，主张抛弃“经济”、“艺术”、“宗教”、“巫术”这样一些历史科学的范畴，自描各个时代各个地域的各种生活现象，提倡致力于叙说单个社会的文化上的特殊性。

他们一本正经地发问道：“一所中世纪的大教堂，把它划为‘宗教’的例证好呢？还是划为‘艺术’的或‘经济’的例证好？”在他们看来，教堂就是教堂，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场所，如此而已。这种只要描述、不要评价，只要现象、不要规律，只要个性、不要共性，只要社会风貌、不要历史发展的研究方法，当然也是不足取的。

唯物史观是研究社会和历史的真正科学观点和方法。它抓住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方面，也不忽视派生的方面；它重视研究单个社会的特殊性，也强调同类社会和各类社会的共同性；它不拒绝描述具体现象，但这种具体已是经由思维掌握了的具体，它相信只有“被理解了的那样的世界才是现实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1页）。可以肯定，在这样的观点指导下，在对历史的经济分析、政治分析已经作了大量工作的今天，一旦把眼光分向文化领域，我们一定能取得象文化本身一样的五彩斑斓的成就。

（原载《文史哲》1984年第1期）

# 中国文化的“再发现”

## ——答《北京晚报》记者薛涌同志

问：庞补先生，听说上海人民出版社正筹划出版一套大型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您作为这套丛书的编委和主要负责人，能否向读者们介绍一下编写这套丛书的缘起？

答：这得从1982年谈起，那年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与复旦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编委会，在上海举行“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我本人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担任一些工作，为准备这个会，和一些同志收集了一些材料，譬如，我们把从1919——1949年，1949——1979年这两个30年中我国大陆关于文化、文化史、文化学的研究状况作了一个简单的统计，统计结果出来后，吓了我们一跳：在头一个30年，出版的有关文化、文化史、文化学的著作有一二百种；而后一个30年，仅仅出版了一种，就是1979年出版的蔡尚思先生的《中国文化史要略》。幸亏我们统计到1979年，若少统计一年，结果便是零。当然数字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它多少也反映了一定的状况。因此，这个问题一提出，就引起与会者的热烈讨论，虽然当时没有正式提出要这样一套书，但已感到了“迫切需要”。

薛：我看了看你们计划编写的书目，有一本就是您和李学勤同志合著的《中国文化再发现》。你们写这部书，有什么具

体的动机吗？

答：这本书本来是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的。我们之所以要写，就是因为国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基本停留在 30 年代的水平上。1949 年以后的事情，宣传得不够，人家了解得不够。有很多新的考古发现，往往能够改变人们的一些传统见解。我们想用 1949 年后的新材料、新观点、新的领域，对中国文化来一个“再发现”。这不仅是我们写某一本书的想法，也是我们编这一整套丛书的想法。我们的计划是，每年出十本，十年内出齐，第一本《中国彩陶史》，估计今年 8 月就可以出版。

问：出版这样一套大型的文化史丛书，不是哪一个人忽发奇想就能解决问题的，它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学术水平、学术潮流的基础之上。特别是现在，我们面临着 30 年的学术空白，要完成这样一套丛书，恐怕得首先转变我们过去那种学术态度、学术倾向、学术潮流。您认为，这种转变是否已经开始了呢？

答：我相信它正在开始。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为什么过去我们对文化史研究不重视？这里有个历史观的问题——我们误解了唯物史观，我们过去那种历史观，只能说是经济史观或政治史观。所以尽管没有人说文化史不重要，但没有人去研究。现在我们重新提出文化的问题，之所以能够一呼百应，就是因为文化是否定不了的。经过了 30 年，大家又终于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所以你所问及的那个学术思潮的变动，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大家没有在学术思想上的反省的话，我们根本提不出这个问题。即使天外来个人提出这一问题，也不会有人响应。

问：现在既然这个问题已经提出，那么就会带来进一步的问题，这就是：面临着一个现代化的世界，我们必须作出一种

与之相适应的选择，即中国必须走现代化的道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将用一种什么眼光来观察中国传统文化？在我们通向 2 世纪的现代化道路中，我们能否站在一个比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更高的高度来反省中国文化？或者说，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荒废了 30 年后，怎样达到比头一个 30 年更高的水平？

答：我想你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即怎样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矛盾。

据我所知，在那些喜欢考虑问题的青年人中间，许多都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对此，我表示理解。传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麻烦，象特权、官僚、贪污腐化、低效率、夸大、空谈、以及鲁迅所说的讨小老婆、抽鸦片烟等等。但是有一条我们应该意识到：想要和传统彻底决裂，想彻底把它抛开，然后重建一个全新的文化，这就好象是一个人想要超出他的皮肤，跑到皮肤以外去一样，不管他怎样努力，是鼓足了一肚子气，还是吃了一身肉，他到底还是在自己的皮肤里面。想和传统一刀两断，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不大可能。不用说在有悠久的文明史的中国，就是在日本，它的发展也没有超出自身的文化传统。

问：我想，我们不妨把人类的体验能力、认识能力分成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对于外部世界的，一个方向是对于人类自身的。人类的认识水平，应该在这两个方向上平衡地发展，过分地内倾，会导致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软弱无力，过分地外倾，会导致人类的异化。

现在的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似乎已超出了对自身的认识，这种“外倾”预示着某种危险，而一向被认为是“内倾”的中国文化，也许对未来世界的发展将起到一个平衡作

用。

答：这太重要了。我可以举一个很小的、也是很普遍的例子。我曾在美国住了二百天。我的房东，是一位老太太，一位寡妇。她去银行取钱，本来可以通过计算机，很快把钱取出来，可是她宁愿排很长的队，从出纳员手里把钱取走。她去超级市场，可以不同任何人打交道，让机器人算帐，然后把东西买走，可是她非要找服务员聊天……从中我悟出了一个道理，这在《大趋势》或《第三次浪潮》中好象也说过：人需要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同物质世界的关系，一方面是同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需要情感上、心灵上的交流。现在的工业化社会，一个方面的东西越来越多，另一个方面的东西越来越少，人越来越感到孤独。

问：这恐怕是现代社会的发展在哲学上对人类的挑战吧？

答：当然。我们强调中国文化的意义，也是因为她对我们迎接这一挑战有好处。因此，我们（特别是青年朋友）在反省我们的文化时，应该站得高些，看得远些。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1985年6月8日）

#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断想

## ——答《未定稿》记者张耒同志

### 一、否定之否定：

#### 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历程

问：仿佛最近一段时期内，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大有开展。您能否向读者提供一点情况，并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答：的确，文化史的课题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了。记得在1980年，我们曾做过一个粗略统计：从1919到1949年的30年里，国内出版的有关文化学和文化史的著作，大概170多种；而从1949到1979的30年里，只出版过一种。固然，解放前的那些著作，有许多是文化史观的，它们以文化演进为历史变化的根本原因，因而文化史的研究得到格外注意；但1949年后完全忽视文化史，未免又走入了另一极端。说起来，这种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具有某种必然性。文化史研究上的冷漠，正是对文化史观的一种批判，也是对唯物史观的一种赞同；尽管这种“批判”和这种“赞同”都带着偏激情绪，但总的说来，整个史学研究，正是这样前进了。

目前，文化史研究又重新得到重视。北京、上海两地，率先出版《中国文化》集刊，着手编纂大部头的《中国文化史丛